

上山下鄉對知青一代 思想形成的影響

徐友漁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上山下鄉只是少數升學落敗者的一種選擇，他們之中多數是因為家庭背景「不好」這種政治劣勢而受到歧視，又或因為「革命理想」的鼓動和宣傳而自願下鄉。但在文化大革命之中，上山下鄉幾乎是每一個進過中學之門的青少年的必然歸宿，知識青年（以下簡稱「知青」）問題成為城鎮居民中幾乎每個家庭的頭痛問題。而短則兩三年，長則七八年的知青經歷，對於正處於形成人生觀、世界觀的青少年，不能不留下了終身難於磨滅的烙印。

毛澤東的上山下鄉動員令「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是在1968年12月22日的《人民日報》上發出的。當年有過知青經歷的人，現在多數已經離開工作崗位，過着退休生活；再過幾年，知青一代將完全成為退出歷史的一代。但另一方面，在2012年底中共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中進入最高領導層的官員當中，有相當比例的人有知青經歷，這又引起人們的關注和遐想。在筆者看來，談論知青問題如果得法，是可以避免流俗的。不論從一代人的思想可以「蓋棺論定」的意義上說，還是從一代新領導登上政治舞台「繼往開來」的意義上說，研究上山下鄉對這代人思想形成的影響，都是有價值的。

在文革中，上山下鄉幾乎是每一個進過中學之門的青少年的必然歸宿，知識青年問題成為城鎮居民中幾乎每個家庭的頭痛問題。而短則兩三年，長則七八年的知青經歷，對於正處於形成人生觀、世界觀的青少年，留下了終身難於磨滅的烙印。

一 制度信念的動搖

文革中上山下鄉的中學生，下鄉前在學校接受的是「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的極左教育，從事的是「造反有理」，批判校長、老師、教材等「教育革命」的實踐，現在又被偉大領袖送到鄉下去接受再教育，他們的思想會不會變得「左上加左」，「革命又革命」？他們會不會成為毛澤東期待的「革命事業接班人」？

事實證明，結果恰恰相反，上山下鄉的經歷使年輕人對現實和現行政策不是持贊成和歌頌態度，而是持懷疑、批判以至否定態度；不是加強了自己以前被教育和灌輸的革命信念，而是動搖和反思那些信念。現實對人的教育是最有

力的，事實勝於宣傳。當然，下鄉知青中也出現了像柴春澤、張鐵生那樣一些被文革派利用和宣傳的「反潮流英雄」，但他們是廣大知青中的反例，與作為整體的知青的思想和行為是背道而馳的。

上山下鄉對於知青最震撼的第一課，是認識到中國農村驚人的貧窮和落後，這與他們以前在課堂上、書本上學到的完全相反，與他們從廣播中和電影裏形成的印象沒有相同之處。一個知青這樣描寫他下鄉的地方^①：

這是一片貧瘠的土地，漫山遍野的麥田，單產只有十幾斤，有時還收不回種子。嚴重的地方病威脅着鄉民的健康，東隊的八個壯勞力，竟都患有柳拐子病，腿、腳關節上的大骨節實在嚇人。這裏沒電、沒煤、沒水，任何一種農副產品加工，如磨麪、榨油，都得靠人力。每年冬天要到溝裏去打柴，以備一年之需。別的還好說，沒水這一條最要命，雨季來了，趕忙修好旱窖，蓄住雨水，全村人一年就靠它維繫生命。陝北旱年又太多，每年經常有兩三個月斷水，這時就得到溝裏去挑泉水。這泉水不乾淨可能有地方病菌不說，最厲害的是挑上擔子，一路不能歇腳，否則就會倒掉半桶水。這可是個硬功夫，一擔幾十斤的水桶，上了肩要一口氣走三四里坡地才上得塬上……

上山下鄉的經歷使年輕人對現實和現行政策不是持贊成和歌頌態度，而是持懷疑、批判以至否定態度；不是加強了自己以前被教育和灌輸的革命信念，而是動搖和反思那些信念。

他還告訴讀者，他所在大隊的黨支部書記，一家八九口人，六個孩子，冬天只有一兩牀棉被，還有人家窮得做不到一人一條褲子，孩子只能輪着穿^②。

另一個知青告訴人們，他們下鄉時得到照顧，分到條件不錯的地方，一個勞動日能核算到三毛錢，這就是說，一個強壯勞力每天最高的收入是三毛錢，婦女、老人、少年、體力不好的人掙的比這個數要少。而旁邊的兩個村子，一個勞動日值六分三厘，另一個值五分六厘。此外，糧食非常短缺^③：

最不好的時候，只能分得一百多斤毛糧，不過不管年景好不好，糧食總是不夠吃的。一到開春，家家就斷糧了，男人們背上搭着空線口袋，尋親訪友，上川下川地跑，翻山越嶺去韓城，東借一點，西借一點；野菜長出來，婆姨女子們在地裏爭着搶着挖，一下子就挖光了，根本輪不上豬吃；川裏盛產柿子，柿子樹葉常常長兩次，剛剛長出的時候，就被採着吃了。家境好的，用玉米麪把樹葉一拌，放在算子上，蒸熟了，灑點鹽，澆點辣子；家境差的，煮一鍋柿葉湯，灑點玉米麪，也能喝個肚兒圓。我插隊的後幾年和一家老鄉夥着吃，我沒少吃野菜和柿樹葉。柿樹葉嫩的時候幾乎沒甚麼味道，老一點了就有些苦澀，也不好嚼了，難以下咽。

在上山下鄉前，知青對於農村條件艱苦、農村比不上大城市是有思想準備的，但農村如此落後和貧窮，實在超出他們的想像，也與以前關於「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說法相距太遠。而且，他們還進一步了解到，農民糟糕的境況與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的亂搞有直接關係，特別是公社化時期搞公共食堂，導

致大量農民餓死。這對於知青來說是駭人聽聞的事情，但在中國農村卻是非常普遍地發生。一個知青在日記中記載說④：

晚上夏某幫我挑穀子回來，閒談時擺到了他的情況：食堂化時他家有六人，父母得水腫病進了「水腫院」，吃不飽，就猛喝鹽開水，結果頭腫得同身子一樣粗，眼睛鼻子都看不見了，雖然天天打針吃藥，終於不治而死。幾個月內，哥哥、姐姐和妹妹相繼過世，剩下他孤零零一個人。

日記中提到的水腫病是中國1960年代初城鄉普遍流行的病症，病因是食物缺乏、營養不良。在城市，飢餓、水腫病與死亡的直接因果關係不如農村明顯，餓死人的比例也遠不如農村那麼高，所以一般年輕人（包括在餓死人年代還處於不懂事年齡的人）沒有「中國在1960年代初大量餓死人」的概念。即便現在有學者論及中國曾餓死幾千萬人，許多受左傾教育和宣傳的年輕人仍然拒絕相信——確實，這樣的事情真是令人難於置信，但拒絕相信的人中很少有當過知青的人，因為他們中大多數人在下鄉期間親耳聽過餓死人的事。

二 適得其反的再教育

青年學生被送到山區和鄉下，原先設定的目的之一是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讓他們用現實生活中的經驗來鞏固和增強原有的革命信念與階級鬥爭覺悟，但普遍發生的情況是，貧下中農告訴知青的實情與他們預想的相反。農民講述的悲慘故事不是發生在1949年之前，而是在那之後，尤其集中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期間；而餓死人的直接原因基本上都是公共食堂化的強迫與農村幹部的蠻橫。知青普遍經歷了一開始驚訝和不知所措，繼而轉變思想的過程。

當時的「革命化教育」和「階級教育」主要採取兩種形式，一是請老一輩勞動者做憶苦思甜報告，講述他們在「舊社會」受剝削、受壓迫、吃不飽、穿不暖的悲慘生活，以及「解放後」當了國家主人的幸福生活，目的是向學生證明「舊社會生活比黃蓮苦，新社會生活比蜜甜」；二是組織大家吃一頓「憶苦飯」，即用粗糧、野草、菜葉等做成難吃的飯，說「這就是解放前勞動人民的飲食」，讓年輕人親口嚐了之後真切地體會一下「解放前的苦日子」，以珍惜現在「幸福無比的生活」。

但知青在勞動中、生活中，尤其是在憶苦會上聽到的，往往是「解放前」的日子比「解放後」好，公社化、學大寨記工分的生活甚至不如給地主幹活，農忙時給地主幹活每天有肉吃——農民並不諱言，地主怕他們吃得不好、不飽致使幹活不賣力氣，而現在每月能吃上一次肉都是奢望。老農民控訴得咬牙切齒、聲淚俱下的都是公社化、公共食堂時期的苦況。一個知青在他寫的書中說⑤：

從學校到社會、從城市到農村，第三代人〔1949年前後出生的人〕首先遇到的問題，就是發現社會實際與書本上說的不一樣。高及春〔另一個知青〕回

知青還進一步了解到，農民糟糕的境況與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的亂搞有直接關係，特別是公社化時期搞公共食堂，導致大量農民餓死。這對於知青來說是駭人聽聞的事情，但在中國農村卻是非常普遍地發生。

憶道：「有一次我們請一位老貧農憶苦，他說，他們村的地主還不錯，實際上最苦的時候是三年困難時期。我們一聽嚇了一跳……」

筆者本人的親身經歷是這樣的：在開憶苦會的頭一天，聽見大隊黨支部書記給第二天晚上登場的老農民再三打招呼：「記清楚，明天你上去憶苦，是憶蔣介石的苦，不是憶劉少奇的苦，千萬別弄錯了。」但第二天晚上的憶苦會上，這位老農在空泛地指控了「舊社會」五分鐘之後，便不由自主地、情緒激動地羅列起「劉少奇時期」餓肚皮、餓死人的種種情況，黨支部書記糾正幾次也沒有效果。後來我們知道，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所謂「劉少奇的罪惡」、「劉少奇讓人吃苦」等說法，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宣傳，把大躍進、人民公社時期的人禍推說為自然災害和推到劉少奇頭上。「憶蔣介石的苦」指「解放前」國民黨統治時期的苦，而「憶劉少奇的苦」指「解放後」共產黨領導時期的苦。在每次憶苦會上，大隊黨支部書記都要給憶苦老農打招呼——「憶苦不要憶錯了」，這說明在農民心裏，對於苦難發生在甚麼時候，他們有明確的、固定不變的記憶。

憶苦飯對知青不苦，反而是美味佳餚，對農民就更是如此。知青從「憶苦飯教育」中得到的結論是：如果解放前勞動人民的飲食就是這麼苦的話，那麼比起現在完全是可以接受的，如果那叫做「苦」，那麼現在知青和農民過的日子同樣苦，甚至更苦。

關於吃「憶苦飯」，一個知青這樣寫道^⑥：

一天，生產隊召開「憶苦思甜」大會，會後自然要嚐憶苦飯。……會議進行中，旁邊那鍋菜稀飯早已瀰漫出團團白霧，發出一陣陣誘人的清香。社員們個個翹首咂舌，不時扭頭望着這團迷人的白霧，心裏巴望發言快點結束。孩子們緊緊圍住那鍋灶不肯離去。當隊長宣布開始吃憶苦飯的話音剛落，人們便爭先恐後，拿碗取鉢，遞到鍋前。兩個掌勺人應接不暇，累得滿頭大汗。我也拿着大搪瓷碗，舀滿一碗，「噓、噓」地只管喝不管燙。這哪是憶苦飯呀，對我們來說簡直是一頓美味佳餚。是啊，吃了幾個月的紅苕早已生厭，現在喝着這香噴噴的厚皮菜稀飯咋不覺得滑膩爽口嘛。不一會兒，一大鍋菜稀飯已是底朝天。大家直說安逸。「憶苦思甜」真箇「成功」了。

憶苦飯對知青不苦，反而是美味佳餚，對農民就更是如此。知青從「憶苦飯教育」中得到的結論是：如果解放前勞動人民的飲食就是這麼苦的話，那麼比起現在完全是可以接受的，如果那叫做「苦」，那麼現在知青和農民過的日子同樣苦，甚至更苦。

三 廣闊天地裏的作為

關於知青上山下鄉，毛澤東曾有一段流傳很廣、影響很大的語錄：「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⑦一千多萬知青上山下鄉，除了極少數被樹立起來的模範和典型，在毛原意上真正大有作為的實在數不出來；但在另一種意義上，即在認識中國的現實、探討中國的命運前途這種真正的意義上，相對於城市嚴峻形勢來說，農村確實是給年輕人提供了較為廣闊和寬鬆的空間。

文化大革命運動搞了兩三年，在知青下鄉的時候，已經進入了「秋後算賬」時期：從1968年年中，開始了「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從1970年初開始，展開了「一打三反」運動和「清查『五一六』份子」運動。在「實行無產階級全面專政」的口號下，各地政府對城市職工和居民的管控不但在各個單位進行，而且發展到街道，甚至大院。人們因為聚會議論國事，閱讀禁書（那時除了《毛澤東選集》和魯迅的書，幾乎所有的其他書籍都被說成是「宣揚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黑貨」），收聽外國廣播電台，甚至因為在日記、信件中流露了對於現實的不滿或批評而被抓捕和判刑，城市街道上貼滿了判決布告。多數情況下，下鄉知青以自己生活和肉體上的苦逃過了政治方面的壓制，這對於那些文革中的活躍份子、好讀書和愛思考的青年來說尤其如此。

下鄉後生活、勞動的艱辛，遠離親人的鄉愁，對於前途的困惑，對於文革將向何方發展的關切等等，使知青的聚會、交流、串連比在城裏更頻繁、規模更大。他們交談的內容十分廣泛，從農民的貧窮、農村的落後，到對於農民憶苦思甜內容的驚訝。唱外國歌曲是知青聚會中最常見的事情，以前在學校這是禁忌，被說成是「黃色」和「下流」。議論政治也不可避免，知青一邊放膽地批評朝政，一邊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我們又在說反動話了」。下鄉知青的思想氛圍與以前在學校中「爭取進步」，爭取入團或當積極份子時不是完全相反，就是大不一樣，原有的革命話語早已消失得無影無蹤。大多數學生對於上山下鄉本來就心存怨氣，他們想不通，如果一定要接受再教育的話，那麼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應該在工廠裏，向工人階級學習，上山下鄉是於理不通的。不少人把上山下鄉當成一種懲罰而耿耿於懷，當毛澤東需要學生起來對劉少奇等「走資派」造反時，就把他們捧為「革命小將」和「小太陽」；一旦不需要了，就說「現在是輪到小將們犯錯誤的時候了」^⑧，無情地把他們從城裏驅趕到農村。可以說，知青下鄉之後自己營造的意識形態氛圍，與以前的「革命化教育」是相反的。

生活的單調枯燥、思想的苦悶使知青比以前更愛讀書，比起城裏人們相互之間的監視，比起文革前學校中班主任、班幹部、共青團無微不至的關照，鄉下的讀書環境簡直可以說是自由的天地，而文革的動蕩和破壞使得大量的禁書從被封存的狀態流傳到社會的各個角落。一個知情回憶說^⑨：

在那個大革文化命的年代，絕大多數書都在被禁止之列。好在陝北是個天高皇帝遠的地方，想讀甚麼書都沒有人干涉。從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到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時代》，從柳青的《創業史》到古納瓦達納的《赫魯曉夫主義》，只要你能找得着，一概可以堂而皇之地公開讀。既不用擔心挨訓斥，也不用害怕被沒收。所以雖說物質生活極端艱苦，精神生活卻反而比在北京來得充實。

這個知青還記敘了他花大力氣借閱《第三帝國的興亡》(*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A History of Nazi Germany*)一書的經過^⑩。此書被許多有知青經歷的人閱讀，並對他們重新思考中國問題產生了重大影響。此書更是文革期間第

關於知青上山下鄉，毛澤東曾有一段流傳很廣、影響很大的語錄：「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一千多萬知青上山下鄉，除了極少數被樹立起來的模範和典型，真正大有作為的實在數不出來。

一重要的啟蒙書籍，它使中國人看到了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與納粹德國的法西斯主義的相似性。

下鄉期間，一些知青從美國之音 (Voice of America) 的廣播中知道了美國阿波羅飛船成功登月的消息。他們一面回味宇航員阿姆斯特朗 (Neil A. Armstrong) 站到月面上說的第一句話：「對一個人來說這不過是一小步，可是對人類來說卻是一大步」，一面哀嘆自己面朝黃土背朝天從事原始勞動。下鄉期間，還有人從蘇聯莫斯科廣播電台的對華廣播中收聽到根據南京知青任毅創作的《南京知青之歌》改編的小合唱，這首歌激發起他們深沉的感情，包括對於現實的懷疑和不满。

下鄉期間，一些知青還接觸到了同代人關於文革、關於中國社會和政治獨立的、批判性的思考。湖南的楊曦光於1968年發表〈中國向何處去？〉，廣州的李一哲於1974年發表〈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⑩，全國各地還有不少影響不等的論說，其中表述的「異端」思想對於勤於思考的知青具有極大的刺激和啟發作用。

1971年發生的「林彪事件」對於知青關於文革的政治信念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此前林彪取代劉少奇被樹立為毛澤東的接班人，這被說成是「文革的偉大勝利」，而現在林彪被說成是「叛國投敵」、「自取滅亡」，那麼文革的意義何在？所謂「偉大領袖毛主席高瞻遠矚、洞察一切」依據何在？特別是，在公布為「林彪反革命集團罪證」的〈五七一工程紀要〉這份文件中，知青讀到了以下文字：「紅衛兵初期受騙被利用，充當炮灰，後期被壓迫變成替罪羔羊」，「農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識份子上山下鄉等於變相勞改」^⑪。對於原有的信念，這種來自統治集團核心的揭露和攻擊比任何其他說法都更具摧毀性。

「林彪事件」對於知青關於文革的政治信念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此前林彪取代劉少奇被樹立為毛澤東的接班人，這被說成是「文革的偉大勝利」，而現在林彪被說成是「叛國投敵」、「自取滅亡」，那麼文革的意義何在？所謂「偉大領袖毛主席高瞻遠矚、洞察一切」依據何在？

四 影響和後果

上山下鄉的經歷，使得知青作為整體具有一些明顯的特點，使得這個群體的行為、思想、個性與其他群體有所不同。

首先應該說，知青這個群體是異質性最強的。具有知青經歷的人，現在既有國家領導人，也有國家的囚徒；既有億萬富翁，也有下崗工人；既有知名學者、作家，也有常年上訪的弱勢群體。他們中有人移居歐洲、北美、大洋洲，也有人將在陝北黃土地上終老一生。

儘管地位、境況有巨大差別，但是知青仍然是最抱團的群體。中學在同一個學校，文革中屬於相同派別，下鄉時在同一個生產建設兵團、農場、縣份或公社，都是日後使人們保持聯繫的紐帶。在中國很多地方有知青協會、知青聯誼會、知青餐館等等，都是昔日知青聚會的地方。雖然在單位裏有上級下級之分，在社會上有富人窮人之別，但不同身份的前知青聚會在一起，總的來說還是比較平等的，他們相互之間往往會照顧和接濟，還會一起返回當年上山下鄉之地，在經濟上援助自己的第二故鄉。

這個群體比任何其他群體更願意、更能夠在社會上大聲喧嘩，使自己的身份特徵變得異常明顯，使知青成為整個社會關注的中心。他們舉辦以「上山下鄉」為主題的大型展覽、大型晚會，讓人們了解知青上山下鄉的一段歷史。知青中湧現出大量的作家，而且其中有不少是知名作家，關於知青的小說、電視連續劇經常風靡一時，且不說還有許多知名的知青導演和畫家等等，他們的作品塑造了社會關於知青、農民、中國農村的形象。知青回憶錄大量出版，使這個群體的自我描述、自我表白——包括自我讚揚——超過了幾乎所有其他群體或階層。

這個群體不但在內部容易打破身份界限相互聯繫，而且易於在社會上與各種身份、地位的人交流和聯繫，他們當中，即使是教授或高官都能說普通老百姓的粗話俚語。可以說，具有知青經歷的官員、知識份子、富豪比較了解中國社會，沒有封閉在自己所屬的階層或小圈子內。

上山下鄉的經歷使人們了解實際、把握中國國情。相較於其他群體，前知青對於左的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最具有免疫力，他們的親身經歷證明，「學大寨」、「窮過渡」、「一大二公」、「割資本主義尾巴」那一套行不通^③。當中國大陸在1980年代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時，得到了全社會的擁護，可以說知青一代人是其中的中間力量。

與此相關，這群人一般而言反對左的政治運動。他們的親身經歷說明，搞運動在任何意義上對國家、對人民都有害無益，搞大批判不得人心，傷害人。所以，在1980年代不斷掀起的諸如「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大批判運動難於得到這代人的支持，再加上胡耀邦、趙紫陽等國家領導人的抵制，基本上是無疾而終。

然而，上山下鄉的經歷對許多人造成了終生難於癒合的精神創傷。他們下鄉前在學校養成的理想主義或英雄主義是徹底破滅了，因為現實生活和親身經歷告訴人們，真實情況與書本上說的、老師教的和廣播中宣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一個名叫苗立新的知青在接受採訪時說^④：

到艱苦的地方去，到中國最需要的地方去，那就是那一代許多熱血青年的信念，極真誠，絕沒有任何亂七八糟的個人目的——要是把那一代人的青春熱血都澆灌到有意義的事業上，要是那些美好的願望、純潔的心靈不被傷害不被玷污，中國的人和事，會比現在好多了……可惜呀，到後來，許許多多的人，血冷了，心涼了，傷了，破碎了。千瘡百孔、破破爛爛地回來了。重整山河難，重整一個人更難。就我說吧，我跟你說，我也不唱高調兒，你再想讓我像當年一樣熱血沸騰、作出犧牲？沒門兒！交了幾十年的「學費」，把青春都搭上了，還傻冒兒？

當然，理想的失落未見得純然是壞事，輕易失去的，多半是虛偽和虛幻的理想。在大多數人失去理想和熱情、走向實利甚至傾向犬儒時，還是有少數人堅持經過苦難歲月淘洗，立足於現實的理想，這樣的理想追求是中國的希望。

上山下鄉的經歷對許多人造成了終生難於癒合的精神創傷。他們下鄉前在學校養成的理想主義或英雄主義是徹底破滅了，因為現實生活和親身經歷告訴人們，真實情況與書本上說的、老師教的和廣播中宣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上山下鄉的經歷固然促使知青了解中國國情，使他們考慮中國的事情可以立足於中國的實際，但從中國的現代化轉型和實現憲政民主的目標看，那還是不夠的。這一代人要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還必須了解人類文明的內涵，了解時代潮流和世界大勢，上山下鄉的經歷並不能提供這些，而這是一些有知青經歷的精英刺眼的缺陷，他們往往失足於國家主義或盲目的民族主義。比如，我們可以從張木生和李零那裏看到，對中國國情的熟悉，對中國現實的批判意識與對國際事務的偏狹理解，對「美帝國主義」的無力攻擊適成鮮明的對照^⑤。

上山下鄉的經歷固然促使知青了解中國國情，使他們考慮中國的事情可以立足於中國的實際，但從中國的現代化轉型和實現憲政民主的目標看，那還是不夠的。這一代人要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還必須了解人類文明的內涵，了解時代潮流和世界大勢。

中共十八大之後，海內外有人斷定中國進入了「知識青年掌權」的時代，他們認為新的領導人上山下鄉吃過苦，懂得中國國情，了解民間疾苦，因此中國的政治大有希望。筆者只能說，希望如此，但是否真的如此，則還需要看。知道中國國情而不了解人類文明的內涵，不了解時代潮流和世界大勢，不能成為英明的領導者。毛澤東生長於農村，他還不清楚一畝地能收多少糧食？他怎麼會相信那些「畝產十萬斤」的謊報？他一門心思想在斯大林死後當國際共運的第一號人物，幻想在幾年內把中國拖進共產主義從而把蘇聯比下去，他的野心與無知給中國帶來慘重的災難，他無視常識，他利令智昏，把自己的農村經驗拋到了九霄雲外。

但願知青一代人的苦痛多少能轉化為中國人的教訓與智慧，轉化為未來的福祉。

註釋

- ①② 王晨：〈塬上的雪〉，載《回首黃土地》編委會編：《回首黃土地》（瀋陽：瀋陽出版社，1992），頁390；391-92。
- ③ 方兢：〈依稀知青夢〉，載孫立哲主編：《情繫黃土地：北京知青與陝北》（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6），頁193-94。
- ④ 支戈：〈再教育日記選〉，載本書編選組編：《知青檔案：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紀實（1962-1979）》（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92），頁189。
- ⑤ 楊帆：《共和國的第三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頁84。
- ⑥ 張建軍：〈搶吃「憶苦飯」〉，載《知青檔案》，頁184。
- ⑦ 顧洪章主編：《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始末》（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頁7。
- ⑧ 許愛晶編著：《清華蒯大富》（香港：中國文革歷史出版有限公司，2011），頁368。
- ⑨⑩ 王曉建：〈求知趣事〉，載《情繫黃土地》，頁94；97。
- ⑪ 宋永毅、孫大進：《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香港：田園書屋，1997），頁274-99、455-93。
- ⑫ 徐友漁：《形形色色的造反：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及演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頁209。
- ⑬ 參見吳思：〈我的極左經歷〉（2008年7月24日），鳳凰網，http://news.ifeng.com/opinion/200807/0724_23_673434.shtml。
- ⑭ 喬淑麗等：〈花兒為甚麼這樣紅——中國女知青紀事〉，《新苑》，1994年第4-5期，頁25。
- ⑮ 參見張木生：《改造我們的文化歷史觀》（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11）。